

汪荣 著

历史再现与身份认同

以新时期以来的
『蒙古历史叙事』为中心

汪荣 著

历史再现与身份认同

以新时期以来的

『蒙古历史叙事』为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再现与身份认同：以新时期以来的“蒙古历史叙事”为中心 / 汪荣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201-0455-5

I. ①历… II. ①汪… III. ①蒙古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①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7328 号

历史再现与身份认同

——以新时期以来的“蒙古历史叙事”为中心

著 者 / 汪 荣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高 雁

责任编辑 / 王玉山 樊学梅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分社 (010) 5936722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1.75 字 数：152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0455-5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著作由海南省特色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资助出版

本书系海南大学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蒙古帝国叙事’中的历史重述与文化记忆”（项目编号：kyqd1552）阶段性研究成果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	6
第三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	16
第四节 框架设计与安排	18
第一章 “民族”的再现：重新思考“蒙古历史叙事”	21
第一节 历史、叙事与民族	22
第二节 文本生成的文化语境	27
第三节 观看“蒙古”的多重视角	32
第四节 朝向未来的历史	38
第二章 “蒙古历史叙事”与“族裔文化象征”	41
第一节 “失败”、性别与民族寓言	42
第二节 历史重述与记忆重塑	56
第三节 正当性的建构与伦理化的历史	74
第四节 蒙汉之间的文化接触与文化交往	86
第三章 “蒙古历史叙事”与“跨族际对话”	109
第一节 “民族”古典史诗的现代演绎 ——以冉平《蒙古往事》为中心的讨论	110

第二节	缠绕的历史与弥合的叙事 ——电影《止杀令》中的民族关系及其 症候式分析	125
第四章	跨民族连结：少数民族比较文学与 “蒙古历史叙事”	139
第一节	跨体系社会与多民族文学/文化关系	140
第二节	区域、生活与交混的“本真性”	144
第三节	协商的汉语，混血的文学	148
第四节	历史重层的当代镜像	153
第五节	“心”的形构中的情感政治	159
结 语	历史的幽灵与比较的视线	162
参考文献		167
后 记		178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崭新的土地上^①，生活着生活方式、文化记忆与精神信仰各不相同的各个民族，虽然他们之间充满了差异性和多样性，却都以“中国”作为生存的空间与认同的对象。然而，当“现代性”的世界浪潮滚滚而来，“中国”本身也面临着巨大的转型。那么，在“转型中国”的新语境下，各个民族如何重新集结，完成“内部的构造”^②，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更具体地说，在各个民族之间，如何产生“普遍性的国民想象”？如何具有“共

① 借鉴霍尔（Stuart Hall）关于“美洲的在场”的论述，姚新勇先生认为中国“在这块大陆上，各族群交往的历史，无论是融洽的交流还是相互的冲撞，都已经上演了上千年之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在场’是古老的在场；但以往的族群交往史，并没有给我们建构起一个经得住新的历史情况和全球化挑战的多样、和谐、有机共存的‘文化中国’，所以‘中国的在场’，的确确又是一个等待着中华各族群去开拓、重构的‘新世界’”。参见姚新勇《寻找：共同的宿命与碰撞——转型期中国文学多族群及边缘区域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64页。

② “内部的构造”为笔者所造，指的是在长时段的文化接触与文化交往中，各民族之间以文学为媒介不断地进行新的排列组合与综理会商，从而生产出与“现代国家想象”相对应的“共同体文学”。在“内部的构造”这一概念中，“内部”意指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部，它相对于“外部”，强调的是国境线以内的政治版图和文学版图。而“构造”包括双重意涵，它既是名词，指涉固态的结构，描述“已经是什么”；它又是动词，强调这一结构的有机性、流动感和液态化，指代“将会成为什么”。“内部的构造”既描述中国文学内部结构的现实状况，又暗示中国文学内部将会发展出的新型的结构。

“共同体感觉”^①？如何形成“跨民族连结”^②？——进而实现“广阔丰饶中国的重构”^③，成为“多民族之巨大中国”^④？这些看似“大哉问”的问题，正是我们思考的起点。

叙事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诚如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说，叙事总是表征着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想象，并且蕴含政治无意识。^⑤“蒙古历史叙事”正是如此。“蒙古历史叙事”描述的固然是过往的历史世界，但在看似简单清晰的叙事表层，却潜藏着作家们的现实诉求和历史想象。这些诉求和想象，又与中国“多元一体”的整体构图息息相关。我们考察“蒙古历史叙事”，目的正在于通过诸多差异性的历史想象，重构中国历史的文学版图，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去和现在。

在新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文化中，“历史再现”始终是一个大的题材类型；在新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文化中，“历史再现”是一种重要的文本事件和文化现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期间，“蒙古历史叙事”的“原画复现”与“家族相似”又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现象。自新时期（1978 年至今）以来，由于题材和内容的相似，“蒙古历史叙事”早已构成了自身的文本序列和文学史脉络。对于如此繁多的创作，当代文学研究界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对此进行的研究十分稀少，这导致了创作与研究的不平衡状况。本书的

① “共同体感觉”的概念为笔者所造。“共同体感觉”是个体对共同体的身体感觉，代表着个体对共同体的物理反应和心理趋向；它由共时性的空间定位与历时性的文化记忆形塑，是处在共同体内部的个体与他者之间所产生的休戚与共、血脉相通的集体体验和集体感受。

② 关于“跨民族连结”概念的阐发，详见本书第四章。

③ 参见姚新勇《族群图腾的再塑与广阔丰饶中国的重构——以三位少数民族裔诗作为例》，《民族文学研究》2013 年第 5 期。

④ [日] 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元》，乌兰、乌日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 11 页。

⑤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 1 页。

选题亦由此生焉：本书将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视点出发，通过跨学科方法的使用，对“蒙古历史叙事”进行分析和阐释。

本书的主标题是“历史再现与身份认同”。之所以将标题定为“历史再现与身份认同”，是因为本书所关注的核心是处在民族历史再现与身份认同建构中的“历史叙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就告别了原本僵硬的社会主义民族写作，走向了返还本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这种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更成为普遍现象。^①同时，这种“回归族裔文化本位性”的身份认同建构就与中国语境下的民族国家话语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的张力关系。那么，在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内部，如何进行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历史叙事”？这种“历史叙事”又如何在民族话语与国家话语之间保持平衡，并在这种结构性的张力关系中完成自己的现实表述和审美超越？

上述问题在“蒙古历史叙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也是本书将“蒙古历史叙事”作为现象域和材料域的原因。因此，本书的副标题是“以新时期以来的‘蒙古历史叙事’为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指称的“蒙古历史叙事”既有蒙古族作家的创作，又有汉族作家的创作，而重点在于考察此阶段多民族复杂交错的文学/文化关系。在“新时期以来的‘蒙古历史叙事’”中包括两个关键词，下面将尝试对这两个关键词分别加以剖析。

首先是“叙事”。在新时期以来的“蒙古历史叙事”中，历史、叙事与现实有着辩证关系，是三位一体的结构。历史不是冰冷的材料，而是带有情感温度的记忆。当作家在现实文化语境下重新书写与演绎历史，历史也就带有了浓厚的寓言意味，成为现实社会的隐喻。由此，“历史叙事”作为“一般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体现了作家主体对现实生活的能动性，它不仅是过往历史的文学再现抑或

① 姚新勇：《反思性的民族认识与形式性的艺术呈现——亚森江·斯迪克〈魔鬼夫人〉试析》，《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4期，第84页。

美学建构，更是指向现实的表意实践。

其次是“蒙古历史”。蒙古民族既是相对于汉族的少数民族，又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蒙古族是一个大民族，并且有着辉煌的历史。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蒙古族事实上还是一个跨境民族，在中国北方的国境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蒙古国”。就此而言，在中国谈论蒙古族就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而“蒙古历史”更体现了这种跨国和跨区域的特点。“蒙古历史”是多重问题的综合体，它涉及了内亚、“新清史”、少数民族王朝定位等现在海外汉学中的热门话题，并且与“中国认同”问题紧密相关。思考“蒙古历史”问题，不仅有利于打破狭义的蒙古族定位，也可以打破既有的狭义的中国定位。

就此而言，蒙古族作家的“历史叙事”自然是我们首先需要考察的对象。蒙古族作家特殊的身份属性使得蒙古历史叙事不同于普遍意义的蒙古历史再现。在蒙古族作家的笔下，“蒙古历史叙事”是一个属于蒙古人的总体性的世界，这是蕴藏在小说文本中的“失落的家园”，其中有蒙古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通过回溯本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追寻祖先的丰功伟绩，“蒙古历史叙事”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情感的生产装置，它借由重温古代历史的方式参与了当代蒙古民族身份的重塑，带有“复归族裔文化本位性”的色彩。当代蒙古族作家正是通过历史书写来进行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声和本民族的文化复兴。

但本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封闭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而是将“蒙古历史叙事”视为一个开放的场域。这就意味着“蒙古历史叙事”并不局限于蒙古族作家，而是题材化了，可以由世界上的任何作家进行书写。蒙古从内亚出发征战四方，曾经占有过欧亚大陆上最为广阔的土地，打破了地域的隔阂，扩大了东西方文化交流。“蒙古历史叙事”是想象“蒙古”的方法，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题材，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打破“蒙古族文学”的藩篱，把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视野吸纳进我们的研究。换言之，这里所指称的“蒙古历史”是一个多重视线交错的场域。在本书中，笔者就用两章的篇幅研究了汉族作家——冉平关于跨族际书写的“蒙古历史”的小说和电影。

最后是“新时期以来”，指的是从1978年到现在。这个时间的节点象征着中国社会从社会主义向“后社会主义”^①的转变，也由此改变了中国整体的文学体制和文化生态，而少数民族亦由此时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从社会主义性到民族性，从一体化到多元化，少数民族文学内嵌于中国整体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之中，也开始了自我身份的形塑和“复归族裔文化本位性”的进程。“新时期以来”的时间前缀的特殊意义，也在于我们要了解这一时间节点中“断裂和跨越”的历史意涵，从而在历史与现实的语境中更好地把握“蒙古历史叙事”的“文本的历史性”。

综上所述，本书试图讨论的主题是“民族话语”与“国家话语”之间的“蒙古历史叙事”。将“蒙古历史叙事”放回到“新时期以来”的时空坐标系中，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类众声喧哗的文本，也是一个充满了“多重逻辑的复杂缠绕”的场域。它不仅涉及中国从传统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从“无限国家”到“有限国家”^②的转型，还涉及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内部多民族文学/文化关系的建构；它不仅涉及地方性传统中多样性与差异性的遮蔽与压抑，还涉及这种地方性传统以何种崭新的方式“打马归来”；它不仅涉及少数民族族裔主体身份的自我隐蔽，还涉及这种主体身份的呈现。毋庸

① “后社会主义”意味着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在某种意义上的“断裂”。参见刘大先《从差异性到再融合：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文学的共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② 这里所指的是从帝国的无限权力的国家到限制了权力使用范围的现代国家。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

置疑，“蒙古历史叙事”发“思古之幽情”的背后，是各种话语之间的抵牾和置换。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正是本书的研究目的所在。

第二节 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

“历史再现与身份认同——以新时期以来的‘蒙古历史叙事’为中心”是一个宏大而庞杂的课题，也是一个颇有难度的课题。尽管如此，对他人相关研究的整理工作和学术史勾勒依然必不可少。系统而有效地整理他人的论述，一方面可以迅速掌握最新的研究动向，对课题有一个全局的观照；另一方面还提示了切入课题的不同的视角，为我们即将展开的论述提供了“见缝插针”的可能。根据本书的研究对象和论述层次，相关研究的梳理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 与“蒙古历史题材”直接相关的研究

（一）蒙古族的“蒙古历史叙事”研究

本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新时期以来的‘蒙古历史叙事’”，主要考察此阶段多民族文学/文化关系，其中尤以蒙古族的历史小说为焦点。与此课题直接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综合性研究与单篇评论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综合性研究，其中包括学者论著和博、硕士论文。首先是姚新勇先生的《文化民族主义视野下的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未刊）。在该论稿的第三章“民族历史的重述：记忆与虚构”第四节“蒙古帝国叙事”中，姚新勇对“蒙古历史书写”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讨论。他将“蒙古帝国叙事”作为“转型期少数族裔历史重述的重要标本之一”^①，在论文中介绍了作品的大致情况，重点考

^① 姚新勇：《文化民族主义视野下的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未刊），第107页。

察了“蒙古帝国叙事的话语方式”和“历史与现实”等。他的研究具有自觉的比较意识，进行了精密的文本细读，且将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起来，在古今交错的对话中把握“蒙古历史书写”，十分有开拓性和示范性。

直接涉及此课题的还有张健的《蒙古帝国叙事——转型期中国大陆地区“成吉思汗”形象的“多元道德化”叙述》（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7）。在此论文中，作者用“道德高低论”的视角来对“蒙古帝国叙事”进行四个核心情节（前代恩怨、手足相残、爱恨情仇、烈烈西征）的比较，且追问了这种多元道德叙述背后的成因。该论文对道德问题的考察十分深入，正是由于这一视角的集中为笔者全面考察此议题提供了契机。^①

带兄的《当代蒙古族汉语小说创作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11）是触及蒙古历史书写的重要论文。在该论文第三章“黄金家族情结”中，他研究了蒙古族汉语小说对黄金家族历史的书写。他对此阶段所有的历史小说进行了扫描，从审美的角度分析了“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完美形象”。但从框架设计而言，他并未有一个全局的观照，而是简单连缀多部单篇小说的分析，这就导致了论述的单薄和不够深入。同时，由于外部研究的缺失，论文在整体上显得不够立体，而较为平面。

包天花的《当代中国蒙古族文学叙事的性别研究》（博士学位

① 此处有必要补充的是本书的选题问题。本书的选题是由姚新勇教授提议的。在笔者写作本书之前，姚新勇先生已经指导了他的硕士张健进行了同题的研究，张健随后写出暨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蒙古帝国叙事——转型期中国大陆地区“成吉思汗”形象的“多元道德化”叙述》。其后，姚新勇先生在张健的基础上进行深度的加工和再创造，写出了《文化民族主义视野下的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未刊）中的第三章“民族历史的重述：记忆与虚构”第四节“蒙古帝国叙事”。写完之后，他依然觉得此议题还有可以深入的空间和开拓的价值，所以建议笔者继续从事该议题的研究。本书的工作主要是对两位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替代性的观点和补充性的论据，是在新的立场和视野下进行的研究。因此，本书是在两位收集的材料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中间有传承和创新的关系。

论文，南开大学，2013）也是一篇涉及蒙古历史叙事的论文。该论文全篇以性别视角切入，对各种文本进行了精致的文本细读。在该论文的第二章第一节中，包天花对成吉思汗叙事的性别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为笔者处理“蒙古历史叙事”中的性别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其他的综合性研究则没有聚焦在此主题，只是在研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小说时稍微提及。李慧君的《当代少数民族史传小说论略》（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7）正是如此。该论文的主要论题为当代少数民族的史传小说，在第二章“当代少数民族史传小说中对于民族英雄叙事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中，“英雄叙事的典型代表：成吉思汗和他的时代”占据了第二节。从该论文的整体架构来说，蒙古历史叙事只是作为英雄叙事的案例被简略地论及，而没有作为核心的议题。同时，该论文的议题太过庞大，导致个案的研究无法充分展开。

此外，徐文海主编的《草原文学论稿》也涉及“蒙古历史书写”。在该书第三编“现当代草原文学”的第六节“草原历史小说”中，作者以巴根的历史写作为中心，在“草原文学”的范畴中对其作品进行了细致的解读。“草原”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框架，它不仅具有风景的维度，同时也提醒我们注意空间、生态等内容在“历史书写”过程中的重要性。

不得不简单提及的还有很多以蒙文书写且尚未翻译的论述，其中包括哈申高娃的《蒙古族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与蒙古人的历史意识——当代蒙古族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主题的阐释》（博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10）。从题目上看，这篇论文在研究对象上与笔者的课题十分相近，但因笔者不通晓蒙文，这部分资料只能付之阙如。

第二类是单篇评论。尽管有关“蒙古历史书写”的小说出版数量很多，但是围绕单部作品的有分量的评论文章并不多，这与当代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现状有关。在“蒙古历史书写”的相关论文中，其写作的中心意旨多围绕作品英雄人物的形象分析和文学内部的审美研究，局限性较大且不够深入。相关单篇评论主要有：

关于苏赫巴鲁的研究。关于苏赫巴鲁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几篇是：廖一的《民族、民间、经典——苏赫巴鲁成吉思汗传记系列论评》（《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3期），廖一的《天籁颂族魂 健笔塑天骄——苏赫巴鲁创作论评》（《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康建强的《苏赫巴鲁文艺创作概论》（《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冯振翼的《殚精沥血铸英魂——论苏赫巴鲁作品中英雄形象的塑造》（《通化师院学报》1998年第1期）。

关于巴根《成吉思汗》的研究。包括：徐文海的《成吉思汗·战争·女人——巴根长篇小说〈成吉思汗〉分析》（《民族文学研究》1996年第2期），谢永旺的《〈成吉思汗〉得失谈——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2期），周双利与于东新的《重现“一代天骄”英雄形象的历史画卷——评巴根的长篇历史小说〈成吉思汗情狩〉》（《民族文学》1996年第4期），庞维天的《沿着民族的心灵之旅漫溯——谈巴根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此外，还有一篇关于作家的报道为张晓华和许洋洋的《巴根：从草原深处走出来的军旅作家》（《中国民族报》2007年8月3日，第12版）。

关于包丽英的研究。包括：张清芳《成吉思汗第36代长孙女笔下的蒙古帝国》（《中国图书商报》2007年6月26日，第5版），王维玲的《〈蒙古帝国〉既写出了“历史”，也写出了“小说”》（《中国图书商报》2007年11月27日，第8版），崇先鸣的《包丽英：游走在蒙古帝国的时空》（《通辽日报》2009年5月24日，第1版）。

（二）汉族的“蒙古历史叙事”小说与电影研究

“新时期以来的‘蒙古历史叙事’”是一个开放性的题材，这就意味着它不仅存在于蒙古族，也存在于汉族作家的笔下。由此，我们研究的版图也将跨越地理的边界，在跨族际的视野中进行。面对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的相关文本，早先的研究工作对我们理解作品有所助益。

冉平的《蒙古往事》是我们重点考察的个案。冉平是当代汉族作家中对蒙古历史书写着力甚勤的一位。《蒙古往事》也以入围茅盾文学奖而出名。尽管如此，关于该作品的评论或研究还是非常稀少，仅有几位研究者稍微提及。例如付艳霞的《浮士德式的一代天骄——读〈蒙古往事〉》（《南方文坛》2006年第2期）和张柠与行超的《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文艺研究》2011年第2期）。后一篇论文将《蒙古往事》放置在当代汉语文学的少数民族题材创作的框架下进行研究，虽然只是稍微提及，但十分具有启发意义。

王坪导演、冉平编剧的电影《止杀令》也是我们研究的个案。围绕这部电影的评论和研究资料有：由燕然和胡龙华采访整理的《冉平：我个人喜欢示弱的东西》（《电影》2013年第5期），这篇文章是该片编剧冉平的自述，对理解电影的创作意图具有重要价值；付宇的《古装历史题材影片创作中的商业性元素——娱乐的历史和历史的娱乐性》（《电影艺术》2014年第1期）对近年来的几部历史古装大片进行了综合的分析，总结了这些电影票房失败的原因和在叙事上的教训。另外，上林的《〈止杀令〉：丘处机让成吉思汗放下屠刀？》（《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8期）和崔理明的《慈爱与仇恨来自哪里？——看电影〈止杀令〉》（《中国道教》2013年第3期）是两篇重要的资料，这两篇文章展开论述的方式都是将历史材料与电影情节进行比对，这为我们深化对电影的理解提供了重要的